

# 蔣介石研究：做什麼？怎麼做？

陳紅民

“蔣介石研究：做什麼？怎麼做？”，是我為2010年4月第一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自由討論”環節所設計的題目。當時學者們貢獻了真知灼見。時至今日，這仍是常常浮現在我腦海的問題。好的問題意識，是引導學術研究前行的基礎，它能使學者清楚地理出最重要的學術路徑，找到最好的選題，牽住研究的牛鼻子，事半功倍，而不至於過分陷入細枝末節，只顧埋頭拉車，結果事倍功半。

要把蔣介石研究引向深入，必須先認清制衡蔣介石研究的諸多因素，瞭解現實環境所允許的尺度。

蔣介石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而特殊地位的歷史人物，他的影響至今仍在，對其研究的重要性與學術價值不言而喻。但對於蔣介石的研究，卻不是個單純的學術問題，歷史與現實、學術與政治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有時現實對學術的影響甚至是更為緊要的。我在《蔣介石研究：六十年學術史的梳理與前瞻》（上海：《學術月刊》，2011年第5期）一文中曾回顧學術史，提出制衡蔣介石研究的因素很多，包括中國大陸自身的社會發展、執政黨的主流意識形態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史學界研究觀念的變化、兩岸關係的演變、學術交流與史料的開放程度等。其中，尤以學者所身處的社會環境為甚。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大陸地區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華民國史與蔣介石研究的學術環境總體上朝著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

2010年初，美國《世界日報》記者採訪我時，對浙江大學能夠在中國大陸建立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並將主辦第一屆以蔣介石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感到驚訝，反復詢問原因。我的答覆是，經過多年改革開放的積累，中國學術界已有足夠的自信與雅量，能公平客觀地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包括蔣介石。這絕非“外交辭令”，而是基於個人經歷的真切感受。1982年南京大學在大陸高校系統首次招收“中華民國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我幸運地被錄取，之後的學習與研究過程中，耳聞目睹了前輩學者在民國史與蔣介石研究之路上的艱難跋涉。

近20多年來，隨著大量珍貴史料，尤其是蔣介石檔案與蔣介石日記的開放，相關學術研究已從“險學”變成“顯學”，成為引人矚目的課題，越來越多的學術單位與學者介入其中，海內外史學界已開過數次關於蔣介石研究的學術會議，國際合作與交流初顯規模。

學術研究的發展，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進行蔣介石學術研究的環境雖仍有不如所願之處，卻是前所未有的寬鬆，是最好的時機。就此而論，我們確比前輩學者幸運太多！

## 二

作為蔣介石故鄉的大學，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科在蔣介石研究方面擁有獨特的地域優勢，前輩學者做了開拓性探索。20世紀60年代，楊樹標教授曾參與《蔣介石傳》寫作組的工作，此項目中途夭折，楊教授矢志不移，終於在1989年出版了《蔣介石傳》，引領大陸史學界風氣之先，在海內外影響甚大。為因應時代變化與學術潮流，推動中國近現代史學科的發展，秉承國際性、前沿性、現實性與可持續性的學術理念，浙江大學於2007年1月建立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此為海內外首個以蔣介石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機構。

與中國社會逐漸走向多元化的趨勢相適應，社會大眾對於蔣介石的認識也逐漸多元化。蔣介石研究在不長的時間裡經歷了從“險學”到“顯學”的過程，坊間有大量關於蔣的書籍，網絡上充斥著對蔣的各種議論。這種寬鬆活躍的環境，對蔣介石研究的繁榮十分有利，卻難免出現良莠雜陳、泥沙俱下的情況。有些作品過分“戲說”，甚至出現了以蔣介石為“賣點”牟取暴利的偽作，最典型的例子是張秀章的《蔣介石日記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年），作者根本沒有看過蔣的日記，居然東拼西湊弄出了上下兩冊的“蔣介石日記”1,000餘篇，流傳頗廣。

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宗旨是推進蔣介石研究的學術化與國際化。所謂學術化，是指基於嚴謹的史料，用科學的方法，追求歷史的真相；所謂國際化，是要與海內外知名高校與研究機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共同推動，使蔣介石研究真正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為達成目標，我們延聘了海內外相關領域的30餘位學者為客座教授，其中既有張憲文、楊天石、張玉法、蔣永敬、山田辰雄、西村成雄、馬若孟（Ramon H. Myers）等知名的資深學者，又有王建朗、陳謙平、吳景平、楊奎松、馬振犢、呂芳上、黃克武、裴京漢、家近亮子、川島真、柯偉林（William C. Kirby）、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圭德（Guido Samarani）、米德（Rana Mitter）等各國各地的學術領軍人物。已有十幾位海內外學者先後在中心舉辦高水平學術講座。中心研究人員廣泛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參加在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加拿大、義大利等國以及台灣、香港、澳門地區舉辦的學術會議40餘次；應邀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大學、南京大學等學術單位舉行講座近20次。

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是中心推動蔣介石學術研究國際化的又一重要舉措。自2007年以來，中心先後聯合海外學術機構主辦了兩次大型國際性學術會議：2010年4月的“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台灣中正文教基金會及香港珠海書院合辦，此為大陸地區首次以蔣介石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2012年6月，中心聯合“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會”（HSTCC）舉辦了“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社會暨第二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1840～1949）”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外，我們還分別與牛津大學、東京大學等單位聯合主辦了三次蔣介石研究工作坊。

為培養新一輩學者對蔣介石研究的興趣，扶助年輕學者的成長，中心與恒勵集團共同推出“恒勵集團研究生論文資助計劃”，面向海內外，資助以蔣介石為主題的碩博士學位論文。迄今已資助五屆，計有南京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雲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及浙江大學等學校的18名碩士博士研究生獲得。獲此資助的同學有的畢業後繼續從事與蔣介石相關的學術

研究，已經小有成就。2013年，中心又舉辦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中青年學者研討會，一批年輕的學者發表了高質量的論文。

有無高水平的學術叢書，通常是衡量一個學科、一個課題是否成熟的重要標誌。中心建立之初就確定要出版“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2013年初，第一批四本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包括《中外學者論蔣介石》、《蔣介石與中國集權政治研究》、《蔣介石與戰時外交研究》、《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第二批的入選作品已經確定。列入叢書著作的作者大多瞭解新的史學理論，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則大量運用扎實的檔案資料，側重實證研究。我們的設想分兩步：首先是在未來三年內出版8~10部，構建一個基本的框架；最終能出版20部左右，確立一個研究體系。希望能有更多的優秀學者將相關研究成果納入叢書之中。

### 三

在以上簡單回顧後，再回到本文主題：未來的研究做什麼，怎麼做？

2010年的那次國際會議上，學者們對於未來的蔣介石研究基本達成了共識，認為應該著重研究台灣時代的蔣介石，研究作為個體的蔣介石。

從時段上看，對於大陸時期的蔣介石研究成果相對較多（雖也多有重新反思的必要），而對於台灣時期的蔣研究較少。而蔣在台灣統治有25年的時間，其執政的內外環境與大陸時期迥異，他的統治手法與理念，甚至個人心理都有巨大變化，故要全面地認識蔣，必須研究他的台灣時代，不能用大陸時期的蔣想當然地去套，反過來，研究蔣的台灣時代，可以加深對其大陸時代的認識。

從選題上看，蔣介石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過去對於其“公”的一面研究較多，甚至於將其符號化，當成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總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總代表”，或是“四大家族”等。不少研究中，無法區分什麼是蔣的個人行為，什麼是國民黨的政黨行為，什麼是國民政府的政府行為。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蔣個人經歷與生活等“私”的方面的研究，如蔣介石的青少年時代、他的晚年生活、讀書生活、家庭生活，他的宗教信仰、人際關係，他的身體狀況與心理分析等。

從1924年出任黃埔軍校校長至1975年在台北去世，蔣介石對中國歷史產生影響長達50年之久。“蔣介石與近代中國”是一個內涵很豐富的大題目，在此之下可以做的課題很多。如從大的方向分，可以有蔣介石與近代中國政治、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經濟、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外交、蔣介石與近代中國文化、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社會、蔣介石與近代中國軍事等；從歷史時段上分，可以有蔣介石與北伐戰爭、蔣介石與國共內戰、蔣介石與抗日戰爭、蔣介石與台灣、蔣介石與重要歷史事件等；從蔣介石個人經歷與生活劃分，可以有蔣的青少年時代、蔣的晚年、蔣的讀書生活、蔣的家庭生活、蔣與宗教、蔣的人際關係、蔣的心理分析等。以上只是簡單羅列，每個課題下面都還可以細分出子課題，如“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外交”主題之下，又可分蔣的國際觀、蔣與美國、蔣與日本、蔣與蘇聯、蔣與英國、蔣與亞洲各國（韓國、越南、印度等）等課題。如此眾多的題目，需要更多的學者將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其中。

毫無疑問，近20年來蔣介石研究之所以有較快的發展，與新史料的發掘與運用密切相關，蔣介石檔案與日記的公開，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國知名學者柯文（Paul A. Cohen）曾對我說，收藏蔣介石日記的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現在成了中國史研究者必去的麥加（穆斯林朝聖的聖

地)。對研究者來說，蔣介石檔案與蔣介石日記的價值，怎麼估量都不過分，對它們的利用尚在開始階段。但是，日記與檔案再重要，也只是史料的一部分，絕非全部。與蔣相關的史料還有很多，文集、報刊、回憶錄、文史資料等，均不可忽略。因而，發掘與整理其他類型的資料，不僅是把蔣介石研究推向深入的基礎性工作，還能拓展蔣介石研究的新思路。譬如，各國外交檔案中均有不少駐華使領館對於蔣介石動向的報告與評估，這將豐富蔣與外國這一課題的研究，即我們過去通常是從蔣如何看外國來著眼的，如果從外國檔案著手，則可以看到外國人是如何看蔣介石的一面，從而有了互動與相互印證。再如，民國時期的報刊有大量關於蔣介石的報導與評論，我們也可以透過這些評論來研究媒體所代表的社會輿論（社會大眾）對蔣認知的變化。

正是基於對史料重要性的認識，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啟動了一項“蔣介石研究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工作，旨在爬梳、整理散落於世界各地的其他資料，包括報刊、回憶錄、檔案等。這類資料可以稱之為蔣介石檔案與日記之外的“第三類資料”。此類資料不僅數量巨大，在內容的豐富性上也遠超過檔案與日記，如果加以搜集匯總，專題整理出版，不僅可以深化目前的研究，也將引發出新的課題、新的視角與新的方法論，從時間與空間上大大拓展“蔣介石與近代中國”這個課題。目前，我們已完成對1926～1949年《大公報》的整理與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所藏蔣介石資料的搜集工作。

#### 四

史學研究的過程艱辛而枯燥，而對涉獵蔣介石相關研究的中國大陸學者來說，艱辛與枯燥之外，還多了些壓力與無奈。甘苦自知，點滴在心。

綜觀學術史，蔣介石相關研究時有曲折。但只要對中華民族有信心，對中國社會一定會進步有信心，就應該相信此一研究的價值及前途。南宋詩人楊萬里有描寫溪水在山間曲折行進的詩句：“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蔣介石相關的學術研究已是千辛萬苦流到山腳前的溪水，只要不避艱難，毅然前行，堅信學術有正道，學者有良心，堅信“梅花香自苦寒來”，所有的付出就一定會有回報。

**作者簡介：**陳紅民，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杭州 310028

[責任編輯 陳志雄]